



实用英语翻译

理论与实践

王 军 桑 鹏 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SHIYONG YINGYU FANYI LILUN YU SHIJIAN

实用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王 军 桑 鹏 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西 安

【内容简介】 本书从中西方的翻译历史入手,讨论翻译的基本概念及四个步骤,即语言现象的理解、语法分析、重组与校核,详细论述汉语与英语两种语言之间句法上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翻译技巧,比如转化法、减词法、次序调整法、分译法,等等。针对当前社会对大量实用型人才的需求,本书着重介绍各种实用文体的翻译,例如科技、经贸、新闻、旅游、政论等,并根据不同文体的特点提出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

本书主要面向英语专业本科、专科学生和研究生,也可供广大翻译爱好者和工作者参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王军,桑鹏著. —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8. 8

φISBN 978-7-5612-6235-1

I. ①实… II. ①王… ②桑… III. ①英语-翻译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6420 号

策划编辑:黄 佩 杨 睿

责任编辑:黄 佩

出版发行: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通信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 127 号 邮编:710072

电 话:(029)88493844, 88491757

网 址:www.nwpup.com

印 刷 者:兴平市博闻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1 000 mm 1/16

印 张:17.375

字 数:299 千字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2.00 元

前 言

我们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全球化和多元化成为当今世界两大并行的趋势。要在多元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下达成共识,推动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发展目标,需要一个沟通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翻译。

翻译在各国人民交流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学者对于翻译的研究起步较早,甚至在古代已经出现了翻译活动,但是这些翻译活动基本局限于文学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和旅游各个方面的交流愈加频繁,出现了大量需要进行翻译的实用类文体资料。传统的偏向于文学翻译的教学很显然无法满足需求,而实用翻译也逐渐代替文学翻译,并成为翻译的主体,社会需要大量具有专业知识的翻译人才。

笔者从事翻译教学及翻译实践数年。在翻译教学 and 实践中,笔者发现传统教学只注重学生基本理论的培养,比如单个词汇的意思,句子结构的用法,很少涉及专业方面的知识。在学生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就会发现,其根本无法应对工作的需求,面对专业性较强的实用文体翻译,往往是手足无措,无从下手。因此,我们的翻译教学应该从理论转向实践,在培养学生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向其渗透专业知识。基于实用文体翻译实践,笔者搜集大量的第一手翻译资料,精心筛选,编写本书,以期培养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全书以“中西方翻译史”开篇,旨在加深对中国西方翻译历史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助推翻译事业的发展。中国的翻译史由五个阶段组成,即汉代—前秦时期、隋—唐—宋时期、明清时期、“五四”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今;西方的翻译史则开始于公元前3世纪,可分为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与现代阶段。

第2章介绍中西方翻译学者所提出的翻译概念,强调翻译的本质,为翻译实践奠定理论基础。本章提出翻译的四个步骤,包括语言现象的理解、语法分析、重组与校核,可以有效指导翻译实践。同时,探讨翻译者应该具备的素质——一名翻译者不但需要深厚的语言功底与文化素养,而且需要渊博的多学科知识与认真的翻

译态度。这些都为翻译者的职业发展指明努力的方向。

第3章详细论述汉语与英语两种语言之间句法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即形合与意合(hypotactic vs. paratactic)、复合与简单(complex vs. simplex)、主语与主题(subject vs. topic)、物称与人称(impersonal vs. personal)、静态与动态(static vs. dynamic)、代替与重复(substitution vs. repetition)和主动与被动(active vs. passive)。本章旨在加深读者对两种语言差异的认知,有利于提高翻译者进行两种语言之间句法结构转换的能力,采用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的语言结构。

第4章提供大量翻译实践的例子,重点探讨翻译实践时可以采用的技巧,包括重复法、增词法、转化法、减词法、次序调整法、分译法、反译法与时态转换法。

第5~11章探讨科技、经贸、新闻、广告、旅游、法律、政论等实用文体的翻译。对各种不同文体的特点进行对比分析,并提出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例如,英语科技文体大量使用专业术语,句子结构上多使用被动语态、名词结构、大量的复杂长句,因此在翻译时,就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化及语篇的调整,从而更加符合汉语的行文规范;经贸文体比较正式,大量使用套句,因此在翻译时,必须注意这些套句的固定翻译模式;新闻翻译中涉及较多的新词、政治敏感词,以及与文化相关的内容,必须对这些内容进行谨慎处理,避免产生误解;汉语广告及旅游文体,在表达上具有鼓动性,词汇丰富,表现力强,多用四字结构;英语广告及旅游文体表达较为朴实,主要以提供信息为主,内容不能过于夸张,在翻译时,需要对表达方式和句子结构进行转换;政论文通常是指以政治问题为中心内容的作品,具有政治色彩浓厚与政策性强的特点,语言上具有丰富的文化色彩、修饰语与范畴词语较多的特点,在翻译时可采用归化性释义、阐释性意译或直译加注释、归化性省译与结构转换等策略。另外,在每一章结尾部分提供各种文体常见词汇,供读者学习参考。

本书理论联系实际,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上,搜集筛选大量实用文体的例句,从词到句,再到篇章,进行深入评析,探究相关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以期期望能够向读者“授之以渔”。另外,本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读其中某一篇章,从而帮助其提高实际翻译能力,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翻译问题。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得到了桑鹏老师的大力支持。桑老师具有丰富的翻译教学经验,对翻译理论研究及实践有着独特的见解,其负责第8~11章的编写工作。笔者负责本书第1~7章的编写工作,全书的结构设计、资料整理,以及最终统稿。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书籍,这些书籍是其作者细致研究和智慧的结晶,在此一并向这些书的作者表示感谢。

本书主要的目标读者为英语专业本科、专科学生和研究生,也可供广大翻译爱好者和工作者参阅。书中瑕疵和疏漏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王军
2018年2月

目 录

第 1 章 中西方翻译史	1
1.1 中国翻译史	1
1.2 西方翻译史	7
第 2 章 翻译概述	14
2.1 翻译的定义	14
2.2 翻译的步骤	15
2.3 对于译者的要求	17
第 3 章 英汉词汇和句法对比	19
3.1 词汇差异	19
3.2 句法差异	24
第 4 章 翻译技巧	72
4.1 直译和意译	72
4.2 重复法和增词法	76
4.3 减词法和转化法	81
4.4 词序调整法和分译法	87
4.5 反译法和语态转换法	90
4.6 数字的表达及翻译	105
4.7 长句的翻译	109
第 5 章 科技英语翻译	115
5.1 科技英语词汇特点及翻译	115
5.2 科技英语句法特点及翻译	123
5.3 科技英语语篇翻译实例与评析	129

第 6 章 经贸英语翻译	138
6.1 经贸英语词汇特点及翻译	138
6.2 经贸英语句法特点及翻译	143
6.3 经贸英语语篇翻译实例与评析	150
第 7 章 新闻英语翻译	161
7.1 新闻英语词汇特点及翻译	161
7.2 新闻英语句子翻译策略	168
7.3 新闻英语语篇翻译实例及评析	173
第 8 章 广告英语翻译	185
8.1 广告特点	185
8.2 广告翻译策略	189
8.3 广告语篇翻译实例及评析	195
第 9 章 旅游英语翻译	203
9.1 汉英旅游文体差异	203
9.2 旅游文体翻译策略	207
9.3 旅游文体难点翻译	215
9.4 旅游英语语篇翻译实例与评析	218
第 10 章 法律英语翻译	227
10.1 法律英语词汇构成特点	227
10.2 法律英语句法特点	230
10.3 法律英语常用句型	234
10.4 法律文本翻译	239
10.5 法律文本语篇翻译实例与评析	244
第 11 章 政论文翻译	252
11.1 政论文文体特点	252
11.2 政论文翻译策略	255
11.3 政论文语篇翻译实例与评析	259
参考文献	266

第1章 中西方翻译史

1.1 中国翻译史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还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认识和发展当下的翻译事业。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①汉代—前秦时期;②隋—唐—宋时期;③明清时期;④“五四”时期;⑤新中国成立至今。

1.1.1 汉代——前秦时期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诸侯国家之间的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84),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30多部佛经。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10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175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支派。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前秦时期,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唯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

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他翻译了 300 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其译文堪称当时的上乘之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学者真谛(Paramartha, 499 — 569)到中国来翻译佛经。真谛在华期间共翻译了 49 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享誉华夏,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较大。

1.1.2 隋—唐—宋时代

从隋代(公元 590)到唐代,这段时间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作都很少。比较有名的翻译家有释彦琮(俗姓李,赵郡柏人),他是译经史上第一位中国僧人。一生翻译了佛经 23 部 100 余卷。彦琮在他撰写的《辩证论》中总结翻译经验,提出了做好佛经翻译的八项条件:①诚心受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②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③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④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⑤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⑥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⑦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⑧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兼通中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彦琮还说,“八者备矣,方是得人”。这八条说的是译者的修养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在彦琮之后,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俗称三藏法师)。他和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华夏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 628)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17 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 657 部,主持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译场,在 19 年间译出了 75 部佛经,共 1 335 卷。玄奘不仅将梵文译成汉语,而且还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将汉语著作向外国人介绍的中国人。玄奘所主持的译场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据《宋高僧传》记载,唐代的翻译职司多至 11 种:①译主,为全场主脑,精通梵文,深广佛理,遇有疑难,能判断解决;②证义,为译主的助手,凡已译的意义与梵文有何差殊,均由他和译主商讨;③证文,或称证梵本,译主诵梵文时,由他注意原文有无讹误;④度语,根据梵文文字音改记成汉字,又称书字;⑤笔受,把录下来的梵文字音译成汉文;

⑥缀文,整理译文,使之符合汉语习惯;⑦参译,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误,又用译文回证原文有无歧异;⑧刊定,因中外文体不同,故每行每节须去其芜冗重复;⑨润文,从修辞上对译文加以润饰;⑩梵呗,译文完成后,用梵文读音的法子来念唱,看音调是否协调,便于僧侣诵读;⑪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

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实践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他还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翻译技巧。据印度学者柏乐天 and 我国学者张建木的研究结果显示,玄奘运用了下列翻译技巧:①补充法(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增词法);②省略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减词法);③变位法(即根据需要调整句序或词序);④分合法(大致与现在所说分译法和合译法相同);⑤译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⑥代词还原法(即把原来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这些技巧对今天的翻译实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玄奘同时的还有失义难陀、义净、一行、不空等译者,也都译了许多佛经。唐末无人赴印度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到了宋代,佛经翻译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在北宋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华夏传法。宋太祖也曾 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专事佛经翻译。虽译场组织极其完备,译经种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当时有名的僧侣译者主要有天息、法护等人。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要数赞宁(俗姓高,今浙江德清人)。他曾归纳了以往译经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六种办法。这是对我国唐代翻译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翻译论库中的宝贵财富。到了南宋,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佛经翻译已是寥寥无几,史书的记载中无一例翻译。在其后的元代,统治者曾下诏拔合恩巴、管主八等人翻译佛经,但译作只有十几部,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更是无从谈起。翻译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1.3 明清时代

在明代的200多年历史中,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几部经书。到明代万历年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标志着中国译著的搜索方向性转变。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于修历的目的,对翻译西方历算书籍感兴趣。1629年朝廷设立了历局,组织传教士与我国历算知晓人士系统编译数学和天文书籍。徐光启、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识之士,一方面自身喜爱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力图以科学

技术改变我国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奉旨参与历局译书之外,还翻译了西方几何、测量、算学、农业、水利、机械及哲学等有关书籍。

明末科学翻译活动启动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触。明末科学翻译是中国少数有识之士企图冲破长期封建保守与夜郎自大的氛围,自觉睁眼看世界之始,不仅与西方传教士热衷传教的翻译目的不同,还不断面临保守官吏顽强的阻力。朝廷支持不够,译人不足,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尚未形成,致使当时已传入我国的一大批西方书籍未能得到译传,使我国错过了一次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极好机会。

严格地说,清初的科学翻译活动主要是围绕康熙皇帝的个人兴趣开展的。他利用传教士翻译了少量关于天文装置、历表及地理、数学等书籍。但这些译稿仅束之内廷高阁,对民间丝毫未产生影响。清初对中国翻译活动唯一有影响的是薛凤祚。他与传教士穆尼阁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对数、天文和三角方面的书籍,使这些知识在民间得以及时传播。

鸦片战争时期,林纾(1852年11月8日—1924年10月9日)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184种西方文学作品,达1 000万字以上。所译小说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有趣的是林纾不懂英文,是由他人口述给他听,然后由他笔录并整理出来。林纾的译著中遗漏删减之处甚多,但可读性很强,对介绍西方文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译作第一次使中国读者接触到西方文学作品,引起了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同时也打破了章回小说的旧格式,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严复(1854年1月18日—1921年10月27日)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898—1911年),这30年间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A.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鸠(C. L. 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宾塞(H. Spencer)的《群学肆言》(*On Liberty*)、甄克思(E. Jenks)的《社会通论》(*A History of Politics*)等。严复每译一书,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常借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表自己的见解。

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在参照古代佛经翻译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公元1898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有人因此认为严复偏重于“达”,从而使得“信”和“达”相互对立起来。事实上,严复曾紧接着解释道:“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说明严复并没有把“信”“达”割裂开来,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悖(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既艰深难懂,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改编。有人说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个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严复重视译文文字润饰这一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尽管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因时代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该标准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尤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将这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不过旧瓶装新酒,已赋予其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严复出版《天演论》的前几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公元1894年在他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已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①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②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③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的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1.1.4 “五四”时期

“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人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

前辈介绍进来。

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他和瞿秋白两人关于翻译问题的通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基本翻译原则。他译过许多俄国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他和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文的风姿。”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顺而不信”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当然,鲁迅这条原则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但与借此作挡箭牌的“硬译”“死译”实无共同之处。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这于借直译作挡箭牌的“死译”也是丝毫无共同之处的。鲁迅和瞿秋白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都十分严肃,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1.5 新中国成立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翻译事业的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毛泽东选集》。我们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翻译水平大大提高,对翻译的标准也达成了共识。我们把外国的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的国情和发展情况介绍到国外。

以钱钟书和王佐良为代表的一批老翻译家和英国学者合作翻译了《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由英国的劳伦斯出版社出版,后来成为20世纪60年代我国翻译《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参照本。1958年由叶君健先生主持的对外英文刊物《中国文学》首次刊登了毛泽东诗词18首,同年6月,在北京外文出版社英文组负责人于宝渠先生的大力协调和努力下,这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毛泽东诗词19首的英文单行本(增加了当年发表在《诗刊》上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后来,经叶君健先生努力,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袁水拍同志参加进来,并邀乔冠华和钱钟书加盟正式成立了由他主持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使这项工作锦上添花,继续往前推进,直至1966年被迫停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翻译、出版领域基本上成为一片荒漠。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形成中国翻译史上又一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翻译家及其理论有矛盾的“意境说”,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论”,钱钟书的“化境论”,焦菊隐的“整体论”,许渊冲的“新译论”。尤其是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绝后的翻译家杨宪益,他与英国夫人戴乃迭一起致力于中国翻译事业,翻译作品遍及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各个门类,共计近千万字,被誉为“翻

译了整个中国的人”。杨宪益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他还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

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得到了解放。翻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翻译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工作，逐步取代了抢译、乱译和重复浪费的现象。

(2) 翻译作品质量大大提高，逐渐克服了粗枝大叶、不负责的风气。

(3) 翻译工作者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消除了过去各种不良现象和无人过问的状况。

(4) 翻译工作者不仅仅肩负着外译汉的任务。

(5) 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日趋统一，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中，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认真的、辛勤的翻译劳动，介绍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1.2 西方翻译史

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3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3—2世纪，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Bible, Old Testament*），即《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

1.2.1 古代西方翻译

公元前4世纪末，盛极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起来。但是，当时的希腊文化仍优于罗马文化，因而对罗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始于这一时期，也可能始于更早的时期。然而，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确已问世。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日后西方继承古

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个翻译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在西方,宗教在社会各个层面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基督教教会一向敌视世俗文学,极力发展为自身服务的宗教文化。作为基督教思想来源和精神武器的《圣经》,自然成了宗教界信仰的经典。《圣经》由西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普遍接受。因此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4世纪这一译事活动达到了高潮,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以哲罗姆(Jerome)于382—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Cicero)。他首次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ut interpres)和“作为演说家”(ut orator)的翻译。西塞罗是从修辞学家、演说家的角度看待翻译的。所谓“作为解释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而所谓“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则是指具有创造性、可与原著媲美的翻译。这样,西塞罗便厘定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从而开拓了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

1.2.2 中世纪西方翻译

中世纪中期,即11—12世纪,西方翻译家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原来早在9世纪和10世纪,叙利亚学者就来到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把这些著作译成阿拉伯语,巴格达一时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中心。后来,在托莱多译成拉丁语的许多希腊典籍便是从这些阿拉伯文译本转译的。于是,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类似于巴格达的“翻译院”),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影响非常深远。托莱多的翻译活动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并且作品主要是从希腊作品向阿拉伯语的翻译。

在这一时期,翻译家主要重复西塞罗和哲罗姆的翻译观点,但也有自己的见解,主要为:①翻译必须严格模仿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法;②必须使用人民的语言。

1.2.3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翻译

14—16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的16世纪及尔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

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古代和当代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在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Martin Luther)顺从民众的意愿,采用民众的语言,于1522—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查普曼(Chapman George)1598—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佛罗里欧1603年所译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蒙田随笔全集》,乃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一群灿烂的明星。而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的翻译出版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又一次大发展。它以其英语风格的地道、通俗和优美赢得了“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的盛誉,在长时期里成为英国唯一家喻户晓、人手一册的经典作品,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多雷(Dolet)认为:①译者必须完全理解所翻译作品的内容;②译者必须通晓所翻译语言;③译者必须避免逐次翻译;④译者必须采用通俗的语言。

1.2.4 现代西方翻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逐渐恢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是翻译事业繁荣兴旺的物质基础。由于时代的演变,翻译的特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时期的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直至形式,都与过去任何时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是翻译范围的扩大。传统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文学、宗教作品的翻译上,这个时期的翻译则扩大到了其他领域,尤其是科技、商业领域。其次,翻译的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过去,翻译主要是少数文豪巨匠的事业;而今,翻译已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不仅文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从事翻译,而且还有一支力量雄厚、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队伍承担着各式各样的翻译任务。再者,翻译的作用也是以往所不可及的。特别是在联合国和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之后,西方各国之间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交往日益频繁、密切,所有这些交际活动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因为翻译在其间起着越来越大的实际作用。最后,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也有了很大变化和进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兴办高等翻译教育,如法国、瑞士、比利时设有翻译学校或学府,英、美、苏等国在大学高年级开设翻译班(Translation Workshop),以培养翻译人员;②成立翻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最大的国际性组织有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国际译联”)以及国际笔译、口译协会和各国的译协;③打破传统方式,发展机器翻译。这第三点实际上是新时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一时期的翻译家及其理论有巴托(Charles Batteux)的“作者是主人”(译者

